

華人聚落在越南的深植與變遷：以會安為例*

黃蘭翔

本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一、前言

今日在越南行政區體系中，那稱為「會安市」的範圍包括 Cam Ha, Cam Chau, Cam Thanh, Cam Nam, Cam Kim, Cam An 六個社，以及今日的市街地區的 Minh An, Son Phong, Cam Pho 三區。然而本文所指稱的「會安」是指後三區的範圍，或是指下列的更小範圍：亦即與沿秋盆河（Song Thu-bon）平行的陳富街（Tran Phu Street）、阮太學街（Nguyen Thai Hoc Street）、白藤街（Bach Dang Street）三條街道與及幾條稱為 Hoang Dieu, Nguyen Hue, Duong Tran Qui Cap, Hoan Van Thu, Le Loi, Nhi Trung 垂直於秋盆河的小徑所交織成的區塊。換言之，也就是指從 16、17 世紀以來華人的主要居住區範圍（圖 1）。

綜觀越南歷史，會安一直都扮演著國際貿易港口的重要角色。但因 18 世紀後半的西山黨（Tay Son）之亂，及進入 19 世紀後河港自然淤積嚴重，另外，法國又在 1884 年正式殖民越南後，建築南北的縱貫鐵道與縱貫公路不經過會安，並且屬意發展在會安北部約 30 公里處的峴港為近代商港等等因素，會安因而失去往日的繁華。但是，因為越南中央政府在 1985 年開始推動指定會安為「史跡地區」，並加上 UNESCO（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的國際協助，尤其是 UNESCO 背後的日本政府，透過其國內的昭和女子大學在建築專業上的協助，會安不僅在 1999 年被登記為「世界文化遺產名單」之一，會安的觀光產業因而有大大的成長，使在 1990 年代僅有 7 萬多人的會安市行政區域，近年來人口有回流的現象發生（照片 1、

* 本文原發表於本院亞太區域專題研究中心與法國普羅旺斯大學東南亞研究所和太平洋研究中心合辦，在法國馬賽舉行的「Search for the Interface: Interdisciplinary and Area Studies i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會議，2004 年 6 月 23-25 日。

2、3)。



圖 1 會安市街區域圖

說明：錦舖亭及關公廟 Nguyen Hue 街福建會館後殿附近可能是會安最早的聚落點（如圖斷線所圈）。沿秋盆河為白藤街、阮太學街、陳富街，都是因秋盆河的自然淤積，分別在 19 世紀、18 世紀、17 世紀末才出現的街道（資料來源：《ベトナム・ホイアンの町並みと建築》）。



照片 1 阮太學街近中央市場處之情景（2004 年 5 月）



照片 2 陳富街 77 號菜宅店屋前面 (2004 年 5 月)



照片 3 陳富街 105 號 (近) 與 107 號 (遠) 店屋前面 (2004 年 5 月)

回顧在 17 世紀前半的會安，儘管有為數不少的日人居留此地，也曾經存在過為時數十年的「日本人町」，但在這約四百年的歷史發展裡，會安卻是一直都以華人城市為名。這些具有中國血統的會安華人，因其南來移民的時期，或因其對越南文化、國家認同的不同，明顯的可以區分為兩個族群。亦即當今耳熟能詳，普遍分佈在東南亞甚至全球地區，並以地緣所組成的會館為活動據點的華人團體，另一則是早在中國明末清初，亦即 16 世紀末，不願臣服清朝的明朝遺臣子民南來越南，後來接受越南以「亭」為中心的傳統聚落文化，以「亭」為活動據點，並自稱為「明鄉人」的華人後裔團體。

本文重在分析會安現場的華人會館廟宇以及明鄉亭的碑文牌匾，加上傳統知識份子所著作的志書史記的文獻，及透過他們對中國年號與越南年號的選擇，以及家祠建築型態的不同，進一步從建築結構之分析等等方法，企圖尋找華人與明鄉人間的異同點，追尋明鄉人落地生根的過程。最後嘗試提在出越南會安可以看到華人與越人結合，及其互相影響下的建築形式。從明鄉人的定居深耕的過程，除分析其與華人不同的移民經驗外，最後希望提供一個思考現今華人的未來出路的借鏡。

二、華人城市會安的發展史

（一）政治發展的背景

1. 越南國內的政治局勢

因為會安的市鎮發展與 15 世紀以後的越南歷史發展有密切的關係，所以在此先對這時期的政治歷史背景作一回顧。越南自從在 939 年獨立稱王之後，經過吳王朝、丁王朝、前黎朝，及後來的長期政權李朝（1009-1225）、陳朝（1225-1400）、明朝的直接統治（1407-1427）後，在 1428 年黎利（Le Loi）擊退中國明朝的軍隊，重新獲得獨立。黎利稱帝為黎太祖，此即黎朝的開始。黎聖宗（1460-1497）於 1471 年，遠征並消滅位於南方的占婆王國。在聖宗崩世後，庸主繼立，在 1527 年時，黎朝政權一度中斷，為朝廷重臣莫登庸所篡。

黎朝遺臣阮淦（Nguyen Kim）擁立莊宗，於清化、義安一帶與莫兵發生爭戰。1545 年，阮淦被暗殺，其婿鄭檢取代他的地位，想要復興黎朝的政權。檢死後由其子松繼續其復興大業，於 1593 年終於光復昇龍城（河內），並迎世宗還都。但是在與莫氏發生爭鬥，企圖復興黎朝的過程中，阮、鄭兩家卻反目成仇，相互鬥爭。結果阮淦的兒子阮潢在 1558 年時，率領故鄉及清化的義勇軍

鎮守南部的順化¹。阮潢之所以願意鎮守偏僻的順化，原是為了逃避其姊夫鄭檢對他日益加深的猜忌之心，然諷刺的是因此而造成了越人南進清化、義安，以及發生大批華人前來移民定居的現象。

其實在以河內為政治中心的安南國（越南），占婆王國尚未亡國前，會安已是占婆王國重要的國際貿易外港。當時北越的鄭氏挾黎朝以統天下，另一方面，以順化為據點的南越地方則為阮氏所統治。後者表面上雖奉黎朝為正統，實際已是完全獨立的實體政權。鄭阮兩者在 1627 年至 1672 年間，雖有有斷斷續續的戰爭，直至 1673 年以後，以凌江為界，形成南北對峙的局勢。相對於北方鄭氏的領土與中國陸路相連，自古以來的錯綜複雜國家間的傾軋關係，對華人的居留有所警惕；阮氏所統治的土地相當貧瘠，為與鄭氏能夠對抗，要藉助華人的力量開發南部地區的土地。對華人禮遇有加，或許因為阮氏禮遇政策的影響，會安華人的口才急遽增加。

2. 中國明清的政治局勢

因為會安是一國際性貿易港口，除了越南的政治局勢之外，當時中國明朝的海禁與日本的鎖國政策，都對會安有絕對性的影響。中國為了防範倭寇，從明洪武 4（1371）年至隆慶元（1567）年實施嚴格之舟楫不入海的海禁政策。解除海禁是因為穆宗聽從了福建巡撫的奏請，准許商民出洋互市。但是此令只適於南海方面之出船與貿易，對於日本方面之渡海及銅、鐵、硝黃等的重要物資之出口仍在嚴禁之列。連帶的促使當時日本主政者豐臣秀吉及其後繼的德川家康，自 1593 年起頒發所謂的「朱印狀」給日本西南方面的「大名」及豪商們，鼓勵他們差遣商船至廣南（會安）、馬尼拉、暹羅阿瑜陀耶（即大城）與南航之華船從事交易，以獲得日本所需的物資（陳荊和 1957：279）。

日本朱印船主要航渡至東南亞各地進行商業貿易活動，其制度確立於 1604 年，實施至 1635 年採取鎖國政策為止，在約 30 年間有 356 艘的朱印船。這樣頻繁地派出朱印船的目的，重在與交趾人從事貿易交換商品，還有另一目的是為了躲避在中國各地嚴峻的海禁，中日兩國商船頻繁間接地前來交趾（會安）進行貿易交換商品。不僅明末的中國文獻載有相關的記載，還有荷蘭人、葡萄

¹ 據陳荊和的〈十七、十八世紀之會安唐人街及其商業〉（陳荊和 1957），可知順化（Hue）是出自陳朝時期的順、化兩州。於 1306 年時，陳英宗聯合占城共防中國的元軍，將皇帝妹妹嫁給占王，占王割烏、里兩州給陳。英宗將其地分割為順、化兩州（及後來的承天府與廣南省），設官駐防，招民墾殖。但是疆吏不得其人，災禍頻仍，及黎朝復興，莫氏餘黨仍有出沒，所以此地被當時的人視為偏僻境地。

牙人的傳教士傳教、商事報告書、私人書信都提到當時的會安情形，特別是中國人與日本人間興盛的貿易活動（岩生成一 1841：21）。

因為中國明朝的海禁政策之解除與日本的朱印船貿易，會安成為華人與日人在海外的交換商品貿易的重要據點。後來因為日本鎖國（1639年至1853年）與明末清初明朝遺臣子民大量前來越南交趾支那國²，華人前來越南的的居住人口比例驟然增加。到了17世紀末，日本人聚落快速消失，會安也成為以華人為主的城市。

（二）會安市鎮街道的發展

1. 17世紀會安聚落的發展

儘管有文獻的記載證明，16世紀中葉以前的會安曾有日人在此居留，但或許因為二次世界大戰時，中日兩國的戰爭對峙，讓當今的會安華人對日本心存疑慮，一般都不承認有過日人聚落的歷史事實。其實，從1618年至1621年曾經居留在會安的耶穌會義大利籍的神父保爾里（Cristoforo Borri）在所著的《交趾支那王國耶穌會士新傳道誌》中，對於當時的華人與日人的聚落有如下的描述：

中日兩國人每年在交趾支那港口，舉行為期約四個月的定期市（Foire）……交趾支那王為了定期市之方便，曾准許華人及日人選擇一適當地點，建設城鎮，稱其為會舖（Faifo）。因地甚為寬闊，幾可認出是兩個市街。一為華人街，另為日人街。各市街分置個別的首領，各依原有的習俗生活。

² 鄭懷德（1765-1825），《嘉定通志》卷三疆域志。「己未三十二年（黎熙宗永治四年，大清康熙十八年）（1679）夏四月，大明國廣東省鎮守龍門水陸等處地方總兵官楊彥迪、副將黃進，鎮守高、雷、廉等處地方總兵地方總兵陳勝才、副將陳安平等，率領兵辦門眷三千餘人、戰船五十餘艘，投來京地思容、沱灤（即今瀚海門，隸廣南營）二海港。奏報稱大明國通播臣，為國矢忠，力盡勢窮，明祚告終，不肯臣事大清，南來投誠，願為臣僕。時以北河屢燭，而彼兵遠來，情偽未明，況又異服殊音，猝難任使。然他窮逼奔投，忠節款陳，義不可絕。且高蠻國東浦（嘉定古之別名）地方，沃野千里，朝廷未暇經理，不如因彼之力，委之闢地以居，斯一舉而三得矣。爰命犒勞嘉獎，仍准依原帶職銜，封授官爵，令往農耐以居，拓土效力。並開諭高蠻國王知之，以示無外。楊、陳等詣闕謝恩，奉旨進行。龍門將楊等兵辦船艘，駛進吹巖（今名雷巖）大小海門（俱屬定祥鎮），駐札於美湫處（在今定祥鎮蒞所）。高、雷、廉將陳等兵辦船艘，駛進芹淦海門，駐紮於同狝處盤轄地方（在今邊和鎮蒞所）。闢地開荒，構立鋪市，商賈交通。唐人、西人、日本、閩巴商船湊集，中國華風已漸漬，蔚然暢於東浦矣」。

關於 17 世紀中葉會安的聚落情形，另有一則日人法蘭西斯哥·五郎右衛門（Francisco Groemon）在 1642 年向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報告中指出：當時的會安，除了做官的以外，日人約有 4、50 人，華人約有 4、5,000 人。另一則文獻，是荷蘭船艦 Delft Haven 在 1651 年航抵會安，船長 Willem Versteegen 在其航海日記中指出：

會舖（Pheij-pho）街沒有幾條街道，主要街道沿河而走。街上大部分的住宅都是用石頭建造的耐火房屋。其中日人的住家有 60 多間，其他的都屬於華人的商家或是匠人的房屋，交趾支那人的房屋不多」。

到了 17 世紀末，會安則演變成以華人為主的聚落，很少看到日人的房舍了。在康熙甲戌（1694）年渡航到會安的僧人釋大汕在其所著的《海外紀事》中，寫著：

會安有各國的客貨碼頭。那沿河的直街，長有三、四里，名為大唐街。夾道商行店鋪連綿不斷，大都屬於閩人的房屋。他們穿著先朝服飾，大多是婦人從事貿易工作。凡是客居此地的華商都娶一越婦以便交易。街的盡頭是日本橋，屬於錦庸地方。河的對岸為茶饒，是洋人商船停泊處。居民稠集，魚蝦蔬果早晚聚集，來往人潮絡繹不絕。在順化不可買得的藥物或是新鮮物品，在會安都可輕易購得。

關於會安在 17 世紀末的情景，英人 Thomas Bowyear 於 1696 年的信函寫到：

會舖位於離河口沙洲三里（Lieu，約 4 公里）處。這是一條沿河的大市街，房屋夾道相連，大約有一百間左右。除四、五家的日橋外，其餘都為華人的住家商號。過去日人是此地重要的居民，甚至有些曾任港務官，至今日人人人口銳減，生活窮苦，所有貿易均為華人所壟斷。

由上述這些記載可以知道 17 世紀初，因為日人的朱印船貿易，仍有不少日人寄居於會安，但是隨著江戶幕府政權的確立，採取了鎖國政策，讓寄居海外的日人數快速減少。就如同會安個案所示，到了 17 世紀末，東南亞的城市就都成為以華人為主的市街地。

2. 華人會館與寺廟興建的年代

因緣於 17 世紀日人活動於會安，日人從 1991 年開始從事會安舊市街的調查，透過考古挖掘及家屋買賣契約書的調查，想確認當時日人聚落的位置。結果僅能在錦舖亭（Dinh Cam Pho）的附近或是陳富街北岸的區塊，發現 17 世紀以前的遺跡，雖然在錦舖亭遺址挖掘出 16 世紀至 17 世紀時，日本與中國的陶瓷器碎片，但是不能確定是否就是日人的聚落遺址。（照片 4）



照片 4 錦舖亭正門（2004 年 5 月）

說明：有 16、17 世紀時期的陶瓷在亭的前庭出土

因為這些調查，確認了陳富街以南的市街，亦即阮太學街兩邊的市街與沿河的白藤街，分別是 18 世紀、19 世紀，因秋盆河河岸的淤積，發展出來的街道。換言之，日人的調查並沒有得到他們想要的答案。但是卻證明了明末清初，明朝遺臣眷屬南來後的市街地發展。

（1）15 世紀華人活動的遺跡

如同上述，可由家屋買賣土地契約書、考古挖掘所得到的結果有限，無法知道 17 世紀以前的會安確切的情形。在此也檢討一下早期的華人會館及與華人

有關的廟宇之興建年代，除了日人的考古挖掘與契約書的研究之外，看看可以探訪多少會安早期的歷史？

目前會安最古的廟宇建築要屬位於偏離市街地北邊的祝聖寺（Chua Chuc Thanh）。寺內有一塊維新乙卯（1915）年所立的石碑，雖然石碑本身並不古老，但是卻寫著會安最古的歷史。亦即在中國明朝的 1444 年，出身福建省泉州府的明海和尚前來會安，創設了祝聖寺。在祝聖寺正殿中脊的底部也有相同的刻記文。假若這 20 世紀所立的碑文記載可信，那麼已有如明海和尚所代表的華人，在 15 世紀中葉的會安活動了。

假如傳說可算是歷史證據，那麼華人活動於 15 世紀的會安的證據可增加一樁。亦即，在中華會館內有民國 17（1928）年歲次戊辰的「重修會安中華會館碑記」，其中有提到「五百年遺鼎」。在 1962 年葉傳華所著的〈會安埠今昔〉（葉傳華 1962）³對此遺鼎亦有所著墨。

葉氏進行實地調查時，據聞已被法人的考古家帶走，已不在中華會館內。於是至當時的法國市政廳詢問，卻又已經被搬離他處，官員僅出示遺鼎照片。葉氏訪談老人說看過該鼎，記得有鼎蓋銘文，鑄有「江浙會館」與「成化」字樣。上述的碑記是 1928 年所立，若往前推算五百年，亦即是 15 世紀初的時候，與明朝的「成化」年間（1465-1487）是相吻合的。

從會館內所存的 1741 年的「洋商會館公議條例」碑文，知道中華會館前身是「洋商會館」⁴。「洋商會館」與遺鼎頂蓋上的文字「江浙會館」不符。儘管 1928 年的碑文指稱最早前來會安的華人是江浙人，其次才是福建廣東人。葉傳華也說遺鼎的原始位置未必在中華會館，但是江浙人先來是歷史事實。無論如何，若老人見過「江浙會館」「成化」字樣的事情為真，那麼這與祝聖寺的碑文所記，是會安可以找到 15 世紀時期最早的碑文記事與傳說資料。

至於中華會館的創建年代，因碑記的證明，中華會館的前身之洋商會館在 1741 年時已經存在，但是創建於何時？其前身是否就是江浙會館？因為沒有具體的資料，無從判斷。

（2）17 世紀會館與廟宇

除了上述的祝聖寺或是「成化」時期的「江浙會館」是會安可以找到的最

³ 葉傳華原居於會安，後來為西貢及順化科技大學教授。

⁴ 據 1995 年所立的「會安中華會館重修簡誌」的記載，得知「洋商會館」在 1928 年改名為「中華會館」。

早歷史資料，另外在錦鋪亭位置的考古出土物也是可發現的少數 16 世紀資料。到了 17 世紀，碑文資料漸多。會館廟宇之創建年代可以上溯 17 世紀的有之，如關公廟與福建會館。雖然無法確切知道關公廟的創建年代，但廟內有由皇帝敕封的立匾，記載「慶德癸巳年季冬穀旦書。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振天尊。明香員各執全設立」。其中慶德癸巳年即是 1653 年（照片 5），所以可以確定在 17 世紀中葉的時候，已有關公廟的存在。



照片 5 懸於會安關公廟內刻有皇帝敕封神祀的木匾（2004 年 5 月）
說明：慶德癸巳年為 1653 年。

至於福建會館（Hoi Quan Phu Kien），據乾隆丁丑（1757）年立的石碑（現鑲立於後殿牆上），記載有已創建六十多年、祭祀「娘娘」的茅草廟宇（照片 6），在 1757 年改建成瓦頂廟宇。雖然廟內所存 1971 年所立的「本會館重修及增建前門碑記」的碑記文，將 1757 年碑文中的「茅廟」解讀為福建會館的前身，並且言及為祭祀六姓王爺，在道光己酉（1849）年的擴建福建會館的後殿建築。

眾所周知，少有稱「天上聖母」為「娘娘」的例子，巧的是在會館後殿左次間祀有「金花娘娘」，所以在此稱為「娘娘」者是否就是「金花娘娘」，有待

考證。1971 年的碑文又提及，在 1757 年改建「金山寺」的茅草廟為瓦廟，改稱為「天后宮」，作為「閩商會館」的據點。無論是祭祀「娘娘」或是「媽祖」的廟宇，於 17 世紀末，被稱為「金山寺」的廟宇就已經存在，則是不爭的事實。



照片 6 立於福建會館後殿牆上的 1757 年石碑（2004 年 5 月）

說明：碑文提及茅草頂的金山寺創建於 60 多年前。

3. 小結

關於會安 17 世紀以前史料，有祝聖寺與出現於洋商會館(中華會館前身)的五百多年前的遺鼎。可以想像在 15 世紀起，華人就已經在此地從事傳教或是貿易的商業活動。雖然它們所在的位置與當今登錄進「世界文化遺產名單」的會安古街道間有何關係？需要進一步的檢討。

然而經過上述歷史資料的整理，可知在 17 世紀的前半，會安有日人與華人的市街。經過日人對家屋買賣契約書的分析與考古挖掘的調查，雖然確認了錦舖亭一帶，早在十六、17 世紀已有日人與華人在此地活動的痕跡，但是無法確切指定其為日人的聚落或是華人的聚落之遺址。在 17 世紀時陳富街的南北兩側沒有居住的痕跡，但是今福建會館接近 Phan Chu Trinh Street 的後殿位置，亦即福建會館的前身茅草頂的金山寺，已經存在於 17 世紀末葉。阮太學街與白藤街一帶的街區，在 18 世紀、19 世紀以前，其地仍然是河川地，不可能是市街地。

在靠近 Phan Chu Trinh Street 的福建會館前身的茅草建築——金山寺，在 17 世紀末就已經出現，加上位於陳富街與 Nguyen Hue Street 交處的關公廟，存在於 16 世紀中葉時是歷史的事實。加上 17 世紀中葉以後，會安逐漸由日華兩市街地逐漸轉變為以華人為主的市鎮。所以我們可以推測其 17 世紀末的華人居住地是以關公廟與福建會館後殿金山寺原址一帶，換言之就是 Nguyen Hue Street 一帶的位置(圖 2)。



圖 2 越南傳統「亭」建築與華人會館、重要廟宇之位置圖

資料來源：《ベトナム・ホイアンの町並みと建築》。

三、明末清初來到會安的「明鄉人」

(一) 會館建築內可找到的「明鄉人」遺跡

前文陳述會安發展之政治背景時，曾提及在 17 世紀中葉以後，亦即明末清初時期，有不少明朝遺臣帶著部下與眷屬來到越南定居。因為這樣的政治歷史背景的發展，會安才會在 17 世紀時起，發展成為以華人為主的市鎮。從會安的市鎮街區的發展，也與人口的成長相互吻合。在關公廟與福建會館後側，亦即 Nguyen Hue Street 一帶是華人在 17 世紀時的聚居場所，後來隨著秋盆河的淤積，逐漸才發展出 18 世紀的阮太學街與 19 世紀的白藤街。

在此令人感到興趣的是，會安是否存在這些明末清初移民的遺跡？其實在中華會館內有「重修會安中華會館碑記」(1928 年)，碑文中有關於明朝遺臣子民的記載。它描述了如下的情形。

「中華會館」就是從前「洋商會館」，今之所以稱為中華，表示不忘祖的意思。越南將會安這個貿易商港改為廣南的重鎮。從前會安為占婆所統治，後歸越南所有，日趨繁盛，最後終成通商口岸。南渡的華僑，起先以江浙人為主，閩粵人次之，揚帆南來會安，就寄居於此地。正當明朝失守，抱持故國情懷的孤臣孽子們，接踵而來，舊有的達官貴人，以競相爭建繁華的居館為名。

會安的「洋商會館」改稱「中華會館」的時間不久，是在 1911 年中華民國建國後的 1928 年。據前文可知，至少在 1741 年，洋商會館就已存在。葉傳華的〈會安今昔〉文章中，曾提及「五百年遺鼎」上鑄有「江浙會館」之記載，其言或可信，1928 年的碑文才有「南渡的華僑，起先以浙江人為主，閩粵人次之」的記述。換言之，會安在明末清初明人南渡之前，早有浙江洋商前來此地從事貿易工作，只是後世完全不存他們的遺跡而已。到了 17 世紀後半，那些明朝遺臣的閩粵華人才逐漸增加。

在《嘉定通志》中對於明朝遺臣子民南來越南定居形成的聚落有清楚的記載。亦即，在 1698 年時，越南南方尚有數以千里計的廣大土地，招募流民四萬戶居住該地，設置社、村、坊、邑的行政單位來區劃土地，征伐占地，訂定徵稅制度，整理土地面積大小及其所有人的資料。華人的子孫居留在鎮邊者，設立「清河社」，居留潘鎮者，設立「明香社」，將居民編入越南行政體系，加以管理。

《嘉定通志》的記載說明了明末清初南來的明代遺臣子民被編入越南以實邊界，開闢疆拓土，建立國防的史實，也提及當時的華人聚落被稱為「清河社」或是「明香社」。問題是「明香」與「明鄉」是相同意思嗎？在《大南實錄》的記記有「更改各地方的『明香社』為『明鄉社』」（1827）⁵。可以見得「明香」與「明鄉」只是時間前後對同是明代遺臣子民聚落的不同稱呼罷了。

既然如此，我們仔細觀察中華會館內的牌匾與對聯的奉獻之屬名與年號，結果發現有重視出身原籍的嘉應幫、福建幫、廣東幫、潮州幫、海南幫的弟子為署名，並以中國清代的年號所奉獻牌匾外，也發現有以越南阮朝年號如「成泰」3年，屬名「明鄉信善族」的牌匾。還有「歲次辛卯」，屬名「信義祠」的牌匾。

從這些署名的牌匾，可以確信的是會安存在所謂的「明鄉信善族」清楚而具有主體性的族群團體，只是有「信善族」與「信義族」的不同而已（照片7）。其實這個署名「明鄉信善族」的族群，在中華會館東側小巷內，有建於明命11（1830）年，重建於成泰7（1895）年，祭祀無人奉祀孤魂的「義祠」（陰魂廟；Mieu Am Hon）（照片8、9、10）。從建築體各處所留下的牌匾與各種文墨資料，顯示「義祠」是由所謂「明鄉社信善族」的族群獨力興建完成。或許「信善族」或是「信義族」並沒有這麼清楚的區別。可以「義祠」為證，在19世紀前半的會安實際存在著所謂「明鄉信善族」的族群是不動的事實。

同樣的情形在福建會館的牌匾對聯，其中有一塊署名「明鄉信善族」，於1851年奉給福建會館的匾額，上面寫著「金山寺重修」的字樣（照片11）。關公廟處的碑文、牌匾、對聯，其署名「明鄉信善族」，並使用越南阮朝年號者更多。不在此一一介紹。

在這些資料中僅能確認「明鄉信善族」在19世紀初已經存在於會安，並且他們屬於「明鄉」人應該無誤。其實，在關公廟東側有一明鄉人的聚會信仰中心「明鄉亭」（Dinh Minh Huong）（照片12），「亭」的建築是越南本土的傳統聚落「社」的中心聚會場所。這種設施的出現更可以肯定會安存在「明鄉」族群的事實（照片13）。

⁵ 《大南實錄》正編第二紀、卷四十七，丁亥明命八年秋七月。



照片 7 懸於中華會館的牌匾（2004 年 5 月）
說明：可看到「明鄉信善族」專屬的署名。



照片 8 由明鄉信善族在 1830 年創建，1895 年獨力興建與重修的陰魂廟
（2004 年 5 月）



照片 9、10 掛於陰魂廟內的牌匾（2004 年 5 月）

說明：詳細說明陰魂廟興建的緣由。



照片 11 嗣德 4 (1851) 年懸掛於福建會館內的牌匾 (2004 年 5 月)
說明：署名為明鄉社信善族，有趣的是不稱福建會館，而稱金山寺。



照片 12 會安明鄉亭 (2004 年 5 月)
說明：創建於 1820 年重修於 1849 年，又於 1905 年移至關公廟旁。「亭」是普遍存在於越南傳統聚落的中心建築。



照片 13 奉祀於明鄉亭正龕的十大老與三大家的牌位（2004 年 5 月）

在會安明鄉亭內，立維新 2（1908）年 7 月的石碑，碑文記有如下的記述。

「明鄉祠奉祀魏、莊、吳、邵、許、伍等姓氏的十大老，他們都是前朝明代的舊臣遺民。雖然明朝已經滅亡，但忠心不肯伺二主，因此隱其官銜、名字，避居南來會安。華人寄居越南者，冠以明字，為了保存其國號。這種明代遺臣寄居者，在越南三十六省都有，而以廣南為始。起初寄居在茶饒，後來遷居會安，勘相河川平原勝地，以通山海之利，都市街道規劃得井然有序，以保永遠的發展。在此地的明鄉子孫都是這些明代遺臣的後代。起初有十大老，後來三大家繼之，亦即洗國公、吳廷公、張弘公三人」（照片 14）。

由這段記載可以見得會安的明鄉人的祖先是魏、莊、吳、邵、許、伍等六姓的十大老，及後來的三大家洗國公、吳廷公、張弘公等明朝舊臣遺民之後代子孫。⁶有趣的是在中華會館、福建會館、關公廟的牌匾對聯中，可發現署名自

⁶ 筆者曾在 1997 年 4 月在會安從事田野調查時，在當地之事菁英葉家松的導引下，告知位於 Phan Chu Trinh 與 Nhi Trung 交口的東北角，越南佛教會（德寶寺；Chua Phap Bao）北側樹林內有「孔如天」的墳墓。因為石刻聖旨的碑文破損嚴重，已經無法辨識。據葉氏所言，孔如天亦是十大老之一，但是孔姓不在六姓中，令人疑惑。根據石碑，

稱屬於廣東幫、福建幫、潮州幫、海南幫等地的華人子弟所寄奉的牌匾幾乎全用清朝年號，或是使用「龍飛」⁷的年號。但是這群「明鄉社信善族」的族人們卻完全可以接受越南皇朝的年號。表示「明鄉社信善族」可以接受並認同越南的國家與文化，他們與一般重視中國出身地的華人幫派具有不同的特質甚為明顯。



照片 14 1908 年立於明鄉亭內的石碑 (2004 年 5 月)

說明：碑文說明了明鄉人的由來與亭創建的細節。對於明鄉社群與會安整體的歷史發展都是重要的參考文獻。

知道在嗣德 2 (1849) 年、保大 17 (1942) 年曾重修過，與墳墓處有「正氣召回明日月，芳名長對錦山川」，可以窺知明代遺臣的心境。墳墓位於會安錦鋪社，也可以看出其對聯中對地點的描述。參與 1849 年重修的署名者有明鄉社、錦鋪社、四幫、信善族；1942 年時重修有中華會館、明鄉社、錦鋪社、信善族。

⁷ 「龍飛」年號是明朝遺臣南來後，不願使用清朝與越南皇朝年號，所創的年號。常見於會安的會館建築中。但其建築上所附的紀年，常有只用干支記法，不用皇朝年號，應該也是同樣的意思。關於會安有歷史文獻之記載橫跨 15 世紀至 20 世紀，若只用干支紀年，往往無法確切比定西元年份，造成研究的困擾。

（二）明鄉亭所祭祀的諸神及其建築興建過程

如眾所周知，華人會館是華人根據中國原鄉不同的出身地，或是宗族血緣關係所興建的宗教、商業中心的聚會場所。而越南的「亭」則是越南自古以來就存在的傳統聚落集會中心設施，雖然在 9 世紀以後受到中國城隍信仰之影響（黃蘭翔 2004），但是與華人的會館之性質有很大的不同。明鄉人的祖先們雖然有清楚的明代遺臣意識，但是經過了兩百年的發展，卻完全融入越南社會，採取了越南以「亭」為中心的聚落聚居的習慣。另一方面，不能融入越南社會的一群華人，則以主祀天上聖母的中華會館（照片 15、照片 15-1）、福建會館（照片 16、照片 16-1），或是祭祀關羽的關公廟（照片 17）與廣肇會館（照片 18、照片 18-1），以及海南會館、潮州會館（照片 19）等會館為華人的聚會中心。



照片 15 會安中華會館（2004 年 5 月）

說明：推測在 1741 年已經存在，分別在 1855 年與 1928 年重建。



照片 15-1 祭祀於中華會館內之媽祖神案（2004 年 5 月）



照片 16 會安福建會館（2004 年 5 月）

說明：其前身是約創建於 1690 年代的金山寺，於 1757 時改建為福建會館。



照片 16-1 祭祀於福建會館內之媽祖神像（2004 年 5 月）



照片 17 會安關公廟內的關羽神像（2004 年 5 月）



照片 18 會安廣肇會館（2004 年 5 月）

說明：創建逾 1796 年，重修逾 1884 年。



照片 18-1 廣肇會館祭祀關公神龕（2004 年 5 月）

說明：傳說廣肇會館的前身為佛寺，自從重建之後，就改為祭祀關公的廣肇會館。



照片 19 會安潮洲會館（2004 年 5 月）

說明：創建於 1776 年，分別重修於 1854 年 1887 年。

我們來看看明鄉亭內所祀奉的諸神：主神龕祭祀會安明鄉人最早魏、莊、吳、邵、許、伍等六姓的十大老及後繼的洗國公、吳廷公、張弘公三大家，並將明鄉社歷代的鄉賢、鄉官、鄉老、鄉長並列在同一木牌上。在主神龕前的神案處立有藥王本頭公、天后聖母、保生大帝的神位。建築的左次間神龕內，立有和尚惠鴻法師牌位、與中國明清時代前來會安的諸賢祖先，及對會安亭之興建與會安社之確立有貢獻的前人牌位。在右次間神龕內，立有信徒鄭門吳氏沙成的牌位、文昌廟明文會員前人的牌位、古齋社里長李有興牌位。

明鄉亭內祀奉的諸神與各華人會館所祀奉的中國原鄉信奉的天上聖母、或是關羽、觀音菩薩不同。這種興建以祭祀當地開墾前人十大老與三大家為中心的「亭」建築，並非是會安的特殊現象，它是越南本土傳統聚落的習慣。

在明鄉亭內立有維新 2（1908）年的碑文，可以看到：

鄭門吳氏發願，捐資買田地附給明鄉亭。惠鴻大師提供祠寺的土地以擴張之，人和事舉，俗厚風淳，天寶物華…。

因此，可以理解神龕內祭祀吳氏沙成或是惠鴻法師的原因。鄭門吳氏及惠鴻大師，都是對明鄉亭的興建捐錢捐土地有貢獻的人物。至於古齋社里長，在

同一塊碑文中記有：

國朝中興功臣有輔國大將軍李公興，從祀於忠勇廟，位列侯伯各種官員有許多人，其名都在史書上可以查得到人物。

因此，可知李有興是對國家有功的大將軍。至於文昌廟明文會員先賢的神位，從嗣德 28（1875）年所立的另一塊石碑，知道在明鄉亭內興建文昌帝君廟及其附屬學校的興建沿革。

至於明鄉亭的興建與遷建過程，在維新 2（1908）年的石碑記有：

明命初元（1820）建前賢祠，額曰萃先堂。嗣德 2（1849）年重修，歷遂既久，應當加以修補屋脊，但因萃先堂位處地夾通衢，喧囂吵雜的地方，於成泰 17（1905）年，占卜遷居於澄漢宮（關公廟）左側，坐北向南，督工者皆悉盡心力，於 4 月開工，完工於 8 月。

還有，在保大 18（1943）年，由曾金鍊所立的石碑，其中刻有：

諸先公南來以後，已有三百多年，建立祠宇多處，歷經歷代的重修，當時各立有碑誌。今將此三處地址相連，使其成為都會的中心，以擴文物之美。但是歲月既久，又不容緩，乃在 1940 年秋天，本（明鄉）社提倡聚集勞工與資金，在佛寺的部分興建正寢殿並新築三關門；澄漢宮則整修各庭院與將各處的彩繪，加以圖漆裝飾，並整修廈軒以為碑室；萃先堂則撤除前瓦舖一間，又遷明文舊廟在正堂之西隅，取其原地，以建造左右兩洋式二房，作為舉辦會同辦事之所，墾治後園，包圍外牆，此其大概的情形。

從這兩塊石碑文可知明鄉亭創建於明命元（1820）年，重修於嗣德 2（1849）年，於成泰 17（1905）年遷建至關公廟左側，與觀音佛寺共同成為市鎮的中心。到了 1940 年秋天，將佛寺、關公廟、明鄉亭加以整修加建，加建如今亦可看到的明鄉亭正殿前洋式的兩棟左右建築。

（三）越南官方對明鄉人的管治

從會安的建築體上可以搜尋出中國明末清初南來的遺臣子民在會安活動的痕跡。明朝遺臣分佈在越南全國，客觀與主觀地發展成為一群具有主體性的「明鄉人」。在會安不但有獨自的聚會場所「明鄉亭」的興建，也靠著族群本身的力量，從事祭祀無人祀奉孤魂，甚至興建完整的義祠（陰魂廟）。有趣的是，雖然

明鄉人的祖先來自中國，但是他們與我們所熟悉的華人團體間有清楚的區隔。他們不歸屬於華人會館，即使在華人會館所寄奉的牌匾、對聯、石碑，其署名與使用的國家年號都與華人不同。除了兩者南來越南的時間有先後不同之外，到底他們在越南定居過程如何？在此想進一步探索。

前文曾經提及黎朝後期鄭、阮兩氏南北對峙，因為南北自然土地的資源，與中國地理接近與否，國防保衛的需要等因素，鄭氏處處設防華人南來定居，南部的阮氏則依賴貿易獲得資源，利用那些明末清初南來的華人以開墾荒地，廣納華人充實邊境。

在《嘉定通志》中記載有：

（在 1698 年）華人的子孫居住在鎮邊者，設立「清河社」，居住在潘鎮者，設立「明香社」。將居民編入越南之行政體系內，加以管理。可以見得阮氏使華人集中居住於所謂清河社、明香（鄉）社的聚落，以方便管理。這是明鄉人聚落之所以形成的重要因素。當時屬於黎朝皇帝針對越南全國，積極命令華人後代子孫獨立設社，在《大越史記全書》中，有如下的記載。在 1663 年時，皇帝搬出聖旨，詔令各處管轄內的居民，若有外國人寄居者，按各別的族群，隨其適宜的居處，以區別不同的風俗習慣。⁸

在《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 34）在 1696 年時，有如下的禁止越南人與華人雜處之規定。

自清朝入主中原稱帝以來，剃剪頭髮，穿著短衣，遵守滿州人的固有習慣。宋明的衣冠禮俗，為之蕩然。華商往來日久，國人亦有仿效的人，乃嚴格飭令各地華人，入籍越南國，規定其使用的語言與所穿的衣服都應遵守國家禮俗習慣。寄居於此的華商，若無知識份子的引介，不得擅入都城城內。地處偏僻之民，也不可以仿效其聲音衣服，違者罰罪之。

這段文字所描述的是 17 世紀末的情形，南北對峙情形已然清楚，雖然黎朝對華人的指令可以被解釋為北部鄭氏政權的政策，但是也可以窺知當時越南人

⁸ 吳士進（1479），《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 19，玄宗穆皇帝癸卯景治元年八月。據藤原利一郎引自《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 33，認為此處的「外國客人」就是「清國客人」。（藤原利一郎 1986：198）。

對於越華間的微妙關係。皇朝希望那些華人入籍越南，積極學習越南語、遵守越南習俗，規定其本國人民不得任意學習華人聲音、衣服。在《大南會典事例》⁹有對於定居越南的華人聚落，其居民要隸屬華人社群，或要歸入「明鄉社」籍的相關規定。亦即，

在 1842 年，朝廷議准：各地若有清人南來投靠，遵守既有的規定案例，將其登入清人幫籍，繳納稅賦。清人幫籍人所出的子孫，均不得剃髮垂辮。年到十八者，幫長即行報官，登入明鄉簿籍，依明鄉慣例繳納稅賦。若不得已乃從該祖父登入清人幫籍。省管轄內，除原有之清人幫外，又有明鄉社民者，該幫人之子孫即由明鄉社登錄籍簿。若省屬只有清人幫，而無明鄉社者，其該幫人之子與孫輩們，暫時登錄為清人幫籍，一旦出現五名以上的明鄉籍人，立即另立明鄉社。儻若僅有一、二人，不及五人者，不應另立一社，聽其併入清人幫登記籍簿，但須註明有明鄉社籍人若干名，一旦湊足五名之數，即另立明鄉社。由該地方官編冊到部裡，照慣例繳納稅收。

文字中所稱的「清人」應是今日稱呼的「華人」。雖然明鄉人是華人之後，但並非所有南來的華人都可以任意登錄為明鄉人，必須是在越南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才可以登錄為明鄉人。也清楚知道阮朝利用收稅的多寡，鼓勵華人後代登錄為明鄉籍。亦即第一代的華人按出身的地緣關係，登記其「清人」之幫派籍屬，遵守華人幫派籍屬的納稅制度。第二代、第三代的子孫不得如其父祖輩的清朝子民剃髮垂辮。年到 18 歲，則報官登記為明鄉籍，遵守明鄉籍的納稅制度。若無法順利登記為明鄉籍人，則隨其父祖入清人幫籍。這段文字也說明了同一鄉社，明鄉籍人需要五人以上才可以獨立設立明鄉社的規定。

其實同樣的規定在《大南實錄》亦有之。其描述越南南部的安江省管轄下的地區，隨著定居子孫繁衍的過程，由原先全是清人幫籍，逐漸轉登記為明鄉社人的案例¹⁰。

⁹ 《大南會典事例》卷 44，戶部清人。

¹⁰ 《大南實錄》正編第三紀卷 30。「戶部奏准，清人初來，登入幫籍，所生之子若孫，到十八歲，著從明鄉社籍。從前冒入者，聽其陳首改著。已而平定奏言，清人子孫七十二人，原冒入幫籍，乞別修籍，名為新屬明鄉社。其明鄉社原額二百八十餘人，名為舊屬明鄉社。再清人七幫人數零星，其憑簿會修一本，名為清人幫。設置屬長，製給木記，許之。南定亦言，原寓清人向來著從明鄉社，請謫出原投居十四名，改為清人幫。所生子孫九名，設為明鄉社。帝以人數無幾，不必別建幫籍，準依原額。嗣有投來或只三五名，併著新籍，俟自二十名以上，情願別立幫籍者，照議辦理」。

(四) 會安華人與明鄉人住宅與祖堂之比較

我曾經在 1997 年對會安陳富街、阮太學街、白藤街上的傳統店屋做過普遍的調查，知道目前住在店屋內的屋主，越南人與華人各約佔一半（黃蘭翔 1998）。據當地居民告知，會安華人有 80% 以上都居住在市街地。因此，若說會安的華人大都住在傳統店屋裡應是不會差太遠的說法（圖 3、圖 4；照片 20、照片 20-1、照片 20-2）。然而有趣的是，在今年五月從事會安現場調查時，曾經訪問福建會管理事謝武進（前幫長的兒子），知道華人的家祠都設在店屋內，沒有獨立興建家祠的案例（圖 5、圖 6、照片 21）。然而會安倒有不少獨立的家祠建築，詢問之下，才知道那大都是明鄉人的家祠祖（圖 7）。

明鄉人有獨立完整、規模又大的家祠，代表了他們在會安定居歲月較久，因而落地生根越南，興建了較為完整的家祠。相對的，現在自稱為華人者，大都是 19 世紀到 20 世紀二次世界大戰前才移來會安定居的第二代、第三代。明鄉人的住家建築型態與華人的店屋細長條形建築也不同，它是屬於越南中部傳統建築之形式（圖 8、圖 9、圖 10、圖 11；照片 22、照片 22-1、照片 22-2、照片 22-3、照片 22-4、照片 22-5）。細長的傳統店屋形式，由單棟建築與中庭形成一單元，從前門到後棟建築，將單元重複排列，形成細長條的店屋住宅。明鄉人的家祠與住宅之關係與華人所居的店屋不同，各自獨立成不同棟建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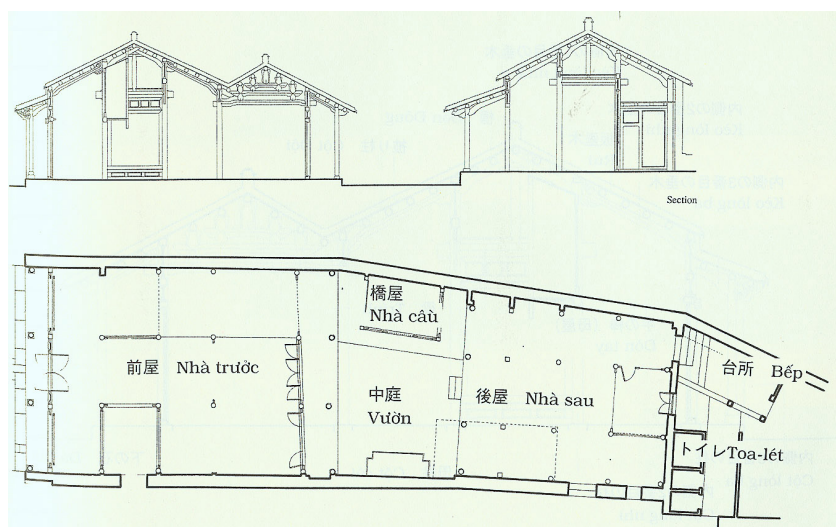


圖 3 陳富街 48 號店屋中間縱剖面圖（上）

圖 4 陳富街 48 號店屋平面圖（下）

資料來源：《ベトナム・ホイアンの町並みと建築》



照片 20 陳富街 77 號店屋中間走道 (2004 年 5 月)



照片 20-1 陳富街 77 號內部建築結構 (2004 年 5 月)

說明：深受中國福建建築影響。



照片 20-2 陳富街 77 號店屋菜宅客廳 (2004 年 5 月)
說明：位於前面商店空間之後，為裝飾最為華麗又面對中庭寧靜的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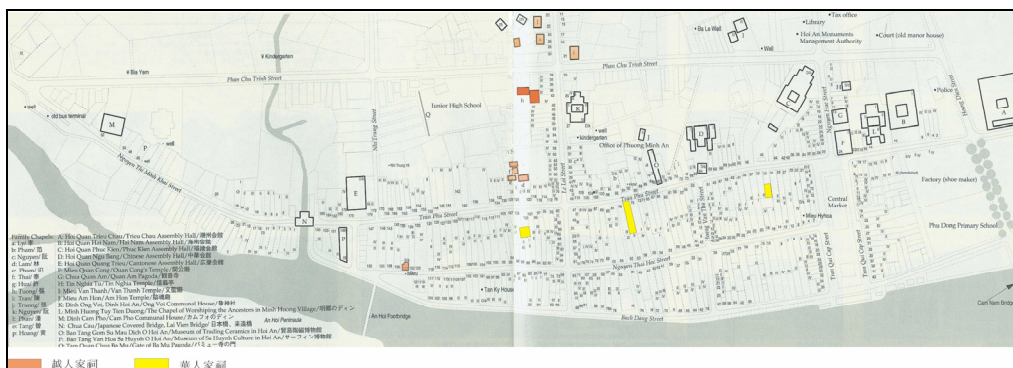


圖 5 會安家祠分佈地點

資料來源：《ベトナム・ホイアンの町並みと建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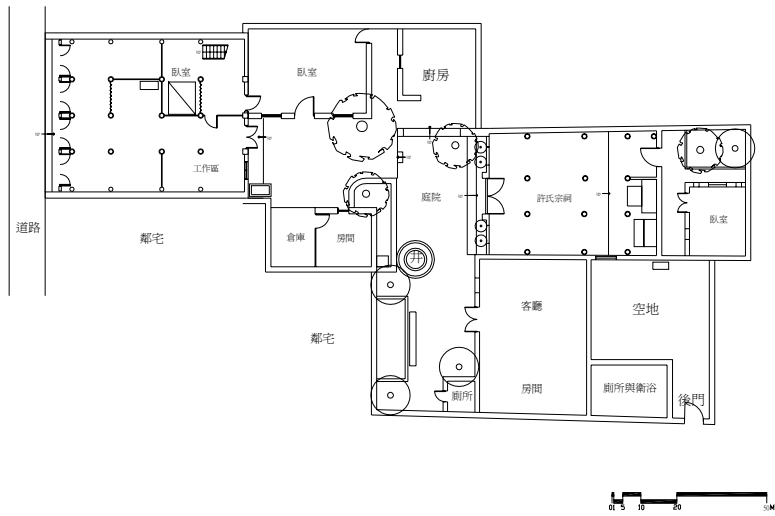


圖 6 陳富街 105 號許氏住家與家祠 (2004 年 5 月黃皎怡、張苑琪測繪)



照片 21 阮太學街 105 號店屋內的羅氏家祠 (2004 年 5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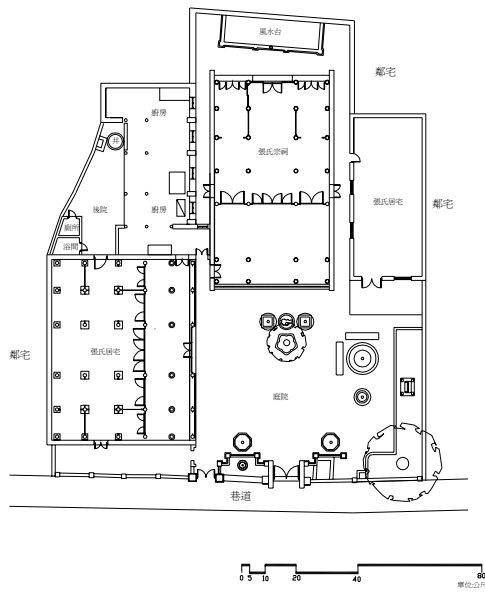


圖 7 會安張惟智住家與家祠平面配置圖
(2004年5月黃皎怡、張苑琪測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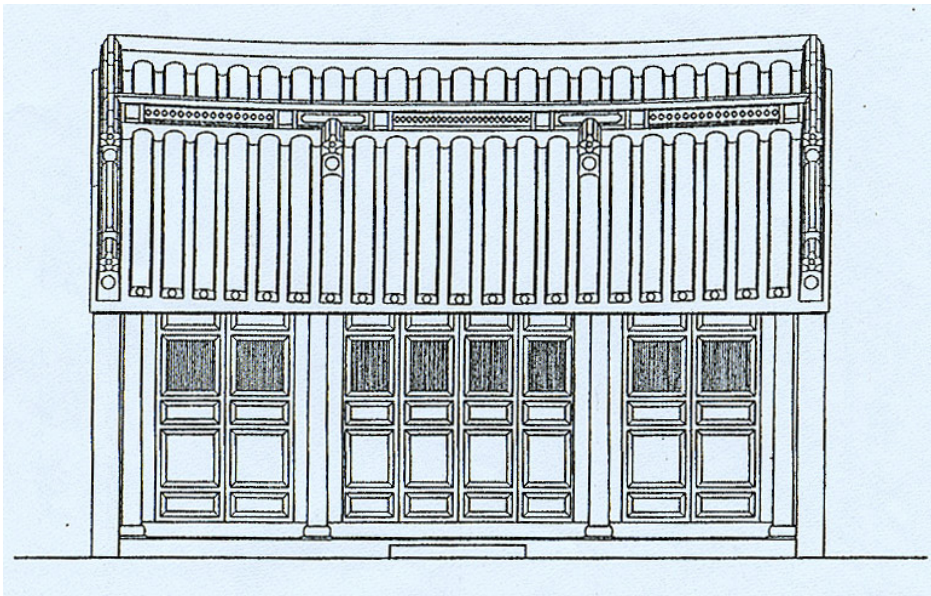


圖 8 會安張惟智宅家祠正立面圖 (張惟智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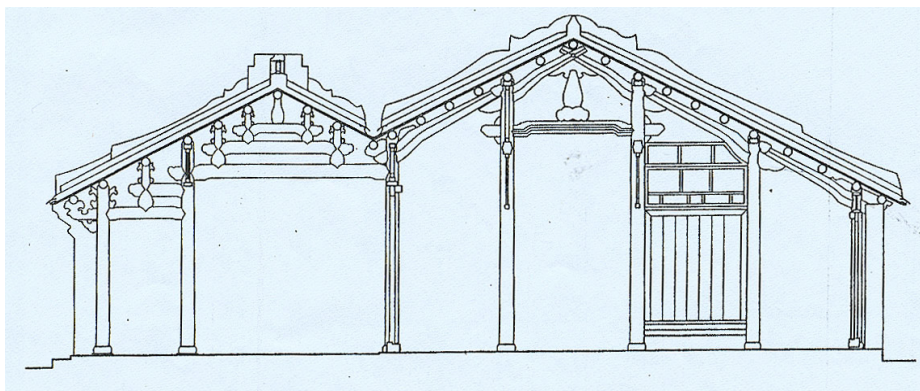


圖 9 會安張惟智宅家祠中間縱剖面圖（張惟智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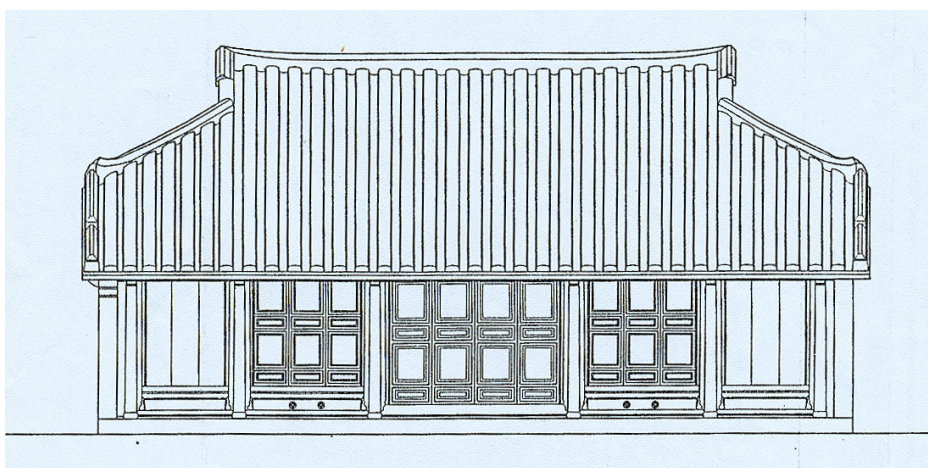


圖 10 張惟智宅住家正立面圖（張惟智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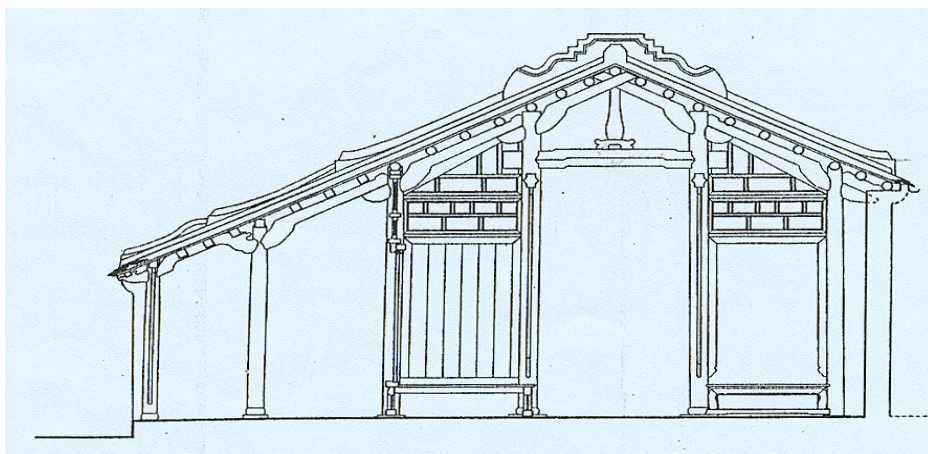


圖 11 張惟智住家中間剖面圖（張惟智藏）



照片 22 張惟智宅大門內庭院（2004 年 5 月）

說明：照片中間為家祠正面。



照片 22-1 張惟智宅住家正面（2004 年 5 月）



照片 22-2 張家祠前半部內部空間 (2004 年 5 月)



照片 22-3 張家祠後半部中間神龕 (2004 年 5 月)



照片 22-4 張宅住家前半部內部空間（2004 年 5 月）



照片 22-5 張宅後半部內部空間（2004 年 5 月）

雖然明鄉人的家祠與住宅的建築特質不同，住宅是越南中部傳統建築形式，但是家祠與店屋建築的單棟建築與中庭形成的建築單元複合體，在空間組織，結構特色上可以明確指出屬同樣特色。他們都是由兩棟建築相結合的的建築，在客廳部分採用中國閩南建築擁有水平樑結構，在正廳裝設神龕祭祀祖先的建築，採用越南傳統建築，亦即類似插手的斜樑特色。

四、結語

因祝聖寺的創建與江浙會館的出現，證明自 15 世紀開始就有華人在會安一帶從事佛教傳教活動與物品交換的商業貿易活動。從 15 世紀至 17 世紀的兩百多年間，雖然沒有任何資料被遺留下來，但是可以想像華人的活動應該沒有間斷過。到了 17 世紀初期才有繁華的華人聚落與日人聚落的出現。後來因為日本的鎖國政策造成居住海外的日本人口的急速減少。相對的，17 世紀中葉以後，中國國內正面臨明清鼎革時期，有不少明朝遺民遷來越南，會安也因此逐漸成為以華人為主體的城鎮。

會安的市鎮街道的發展隨著秋盆河逐漸淤積，市街地也隨之擴大。在 17 世紀時，會安僅有錦舖亭附近和以 Nguyen Hue Street 為中心的關公廟、福建會館後殿靠 Phan Chu Trinh Street 地區已有市街地的形成。現在會安最主要的陳富街的南側及阮太學街兩側是 18 世紀，而沿河的白藤街則是 19 世紀以後才出現的街道。

自 17 世紀以來，會安市街的發展過程，正好是會安明鄉人及其族群落地生根的發展過程。明鄉人第一代是清末明初的遺臣子民，黎朝政權及位於廣南地方的阮氏政權，積極接納明朝遺民前來開疆拓土，但是對這群遺民採取設立「清河社」、「明香（鄉）社」，與越南人民區隔分居的政策。到了清朝之後，阮朝對收編南來越南清國籍民，制訂了一定的辦法。亦即第一代清國籍民，登入清人幫籍，第二代以後的清國籍民，限制清人習慣剃髮留辮的習慣，一旦年齡成長至 18 歲，則由幫長報官登記為明鄉籍。若有五人以上的明鄉籍民，即可獨立設立明鄉社。

根據當地的石碑、匾額所留下來的資料，可以證實會安的明鄉籍民也是明代南來的遺臣子民子孫，雖然不清楚會安所稱謂的「明鄉社信善族」的形成年代，但是可以確切知道 19 世紀時，不但以具體的族群署名，使用越南皇朝年號，寄贈牌匾給華人會館，進而以族群獨自的力量興建祭祀孤魂野鬼的「義祠」，甚至在 1820 年，模仿越南傳統聚落之本土文化，興建了聚落聚會中心的「亭」建

築。

若比較華人與明鄉人的居住建築，會發現明鄉人採用越南中部的傳統住宅樣式，華人則住在店屋建築裡。明鄉人有獨立的宗祠建築，華人則將家祠設在店屋住宅內，如今的會安尚未有華人建獨立家祠之案例。但是會安的建築，混合了中國福建廣東的建築結構之外，也結合了越南當地的獨特結構特色。從建築的結構可以清楚瞭解中國東南沿海建築與越南本土建築結合的文化整合。

參考書目

ホイアン町並み保存プロジェクトチーム編。1997。《ベトナム・ホイアンの町並みと建築》。東京：昭和女子大学国際文化研究所。

岩生成一。1841。《南洋日本町の研究》。東京：南亞細亞文化研究所。

陳荊和。1957。〈17、18世紀之會安唐人街及其商業〉。《新亞學報》，3（1）：273-332。

黃蘭翔。1998。〈越南會安與臺灣鹿港傳統店屋建築之比較〉。PROSEA Occasional Paper No. 24.

黃蘭翔。2004。〈試提分析越南傳統「亭」建築的兩個必要觀點〉。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主辦，「2004年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2004年4月22-23日。

葉傳華。1962。〈會安埠今昔〉。《遠東日報》。

藤原利一郎。1986。《東南アジア史の研究》。京都：法藏社。